

◎汉学一家言

汉学和汉学研究漫议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现状之管见

汉学与人类间的文化交流

◎汉学家专页

20 世纪的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

卫礼贤的中国魂

我所认识的山田庆儿先生

◎西方早期汉学史

神奇的东方——皮列士《东方志》

摘要

遥望中国——基歇尔的《中国图说》

◎中西文化交流史

饶宗颐先生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

英敛之和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兴起

◎任继愈／主编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变文之后的中国图画讲唱艺术及其外

来影响

◎中国科技史研究

中国传统数学的含义

略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特点

与中西科学互动

◎宗教研究

西方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

儒家传统的宗教特征

◎国际汉学研究史

19 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

◎汉语研究

16 至 18 世纪传教士与汉语研究

20 世纪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概观



大象出版社

◎ 任继愈 / 主编

第

國

六

際

輯

漢

學

International Sinolog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汉学.第6辑/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编委会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12

ISBN 7-5347-2481-3

I. 国… II. ①任… ②国… III. 汉学-研究-世界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2262 号

责任编辑 孟建华

责任校对 范秀娟 郭一凡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编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393千字

定 价 26.60元

目 录

汉学一家言

- 汉学和汉学研究漫议 阎纯德(1)
-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现状之管见 方 骏(9)
- 汉学与人类间的文化交流 程裕祯(17)

汉学家专页

- 20 世纪的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
..... [法]谢和耐 耿昇译(20)
- 卫礼贤的中国魂 张东书(34)
- 我所认识的山田庆儿先生 廖育群(48)

西方早期汉学史

神奇的东方

- 皮列士《东方志》摘要
..... [葡]多默·皮列士 何高济译(57)
- 一个葡萄牙冒险家的传奇
——平托和他的《游记》 高 倩(70)
- 平托《游记》中宁波纪事考实
——兼谈《髡余杂集》中的佛郎机资料 汤开建(89)
- 遥望中国
——简介基歇尔的《中国图说》 张西平(120)

中西文化交流史

- 饶宗颐先生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 王振泽(138)
 英敛之和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兴起
 [美]唐纳德·帕拉贡 辛岩译(151)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 变文之后的中国图画讲唱艺术及其外来影响
 [美]梅维恒 张国刚 陈海涛译(201)
 《红楼梦》中的命名 [美]米切尔·扬 杨春译(218)

中国科技史研究

- 中国传统数学的含义 [澳]何丙郁(249)
 本草的分类思想——从世界图象到技术
 [日]山田庆儿 康小青译(260)
 《阴阳的催眠剂》——雅基博士对华夏科学的分析
 [奥]雷立柏(295)
 略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特点与中西科学互动
 王扬宗(318)

宗教研究

- 西方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 [法]傅飞岚 徐克谦译(337)
 儒家传统的宗教特征
 [美]罗德尼·L·泰勒 魏长宝译(371)

国际汉学研究史

- 19 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 李明滨(400)
 捷克汉学简史及现状 姚 宁(425)

汉学机构介绍

捷克东方研究所 姚 宁(449)

汉语研究

16 至 18 世纪传教士与汉语研究 许光华(456)

20 世纪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概观 缪小放(491)

书评与书介

节日:社会的透镜——《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评介

..... 侯旭东(508)

一部有用的工具书——《汉学书目杂志》..... 杨保筠(517)

编后记 (520)

汉学和汉学研究漫议

□ 阎 纯 德

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话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是的,中国文化从未断流,它一直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带着中国文化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成为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于是就有了“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①汉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门专学。

汉学从萌芽到发展和成熟,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它的真正建立,应当归功于大批入

^① 阎纯德:《汉学研究·序》,第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

华的耶稣会士。从那时开始,西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于是将中国文化作为介绍和研究对象的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俄国等国家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方文明依仗科技、工业、商业之优势,以不文明的方式压制东方文明,致使东西方之间长期处于不和状态,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写满了宗教怀柔和炮火相加,“交流”伴随着掠夺,但是这个不平等的“交流”却衍生了一对文化双生儿:“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这一双不平等的文化孪生儿的成长过程创造出了汉学。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西方知识分子认识、研究、理解、接受中国文明的历史。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汉学的发生和兴盛发达。西学东渐的同时,也为中学西传开通了道路,架起了桥梁,为汉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欧洲为先驱,汉学是在西方一代代汉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传统的。

汉学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续。但是,它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就是说,汉学对我们中国文化具有镜子的作用、借鉴的意义。

二

现在谈论什么是汉学的问题似乎可笑。事实上,何为汉学,是需要明确或澄清的。时至今日,国内几家汉学研究所及其出版的书刊,所指的都不是汉代以降文人在经学研究方面以重名物、训诂、考据为主的那种“汉学”,皆系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方面的学问。前者延续至今的,很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国学”,这可以从北京出版的《国学研究》和台北出版的《汉学研究》得到证实。现在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汉学”从原来的

(国内汉学)认识上剥离下来,这有利于汉学研究的规范化。李学勤教授在《国际汉学漫步》序言里说:“‘汉学’,英语是 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 SINOLOGY 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一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较为方便。”还说“‘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 SINOLOGY 的词根 SINO 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①我很赞同这个看法。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外国学者和中国多数学者构成的共识,或者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约定俗成。但是为了同“国内汉学”区别,学术界还是有了“国际汉学”、“海外汉学”或“世界汉学”的说法。以我的看法,最好是把“国际汉学”“海外汉学”“世界汉学”统称为“汉学”,“国内汉学”称为“国学”。当然,大家可以采用不同的叫法,各行其是也未尝不可。关于“汉学”和“中国学”,“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从传统上讲是有区别的,前者更传统,更富有欧洲之人文精神,偏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介绍,而后者则多一些现代性,多一些包容性,更偏重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和考察。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管是“汉学”,或是“中国学”,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致的,其研究和考察对象是一个从古至今的整体中国及其历史文化。

三

什么是汉学研究? 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再研究。这种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近于空白。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清朝末年,王国维算是较早对汉学有着深刻认识的中国学者,在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并翻译了他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结论》后,认为伯希和的看法“优于中学”。但是,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实在太少。戊戌变法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也有人介绍和研究西方汉学,但毕竟还是寥寥,系统的汉学研究更是少见。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年代里,中国的先觉者,所关心的是中国的生存或自救,看重的是西方的科学和坚船利炮,而对自己文化里派生出来的汉学无暇给予太多的关心。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驱们,看重的是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批判和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移植和吸纳,对汉学研究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说到汉学研究,倒是日本人先走了一步。比较早的,有日本的石田干之助的《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年出版)和《欧美的中国研究》(1942年出版),以及后藤文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起源》(1933年出版)。直到1949年,中国学者莫东寅才出版了汉学研究专著《汉学发达史》(文化出版社)。这部汉学研究著作虽然比较简单,但其意义深远,因为我们毕竟有了第一部汉学研究著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30年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几乎不谈汉学。而学界自发地较多地关心汉学和开始研究汉学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给汉学研究带来的契机,经过20年的发展,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汉学已被学界普遍关注,而且专学、显学的色彩越来越浓,在它的大门前熙来攘往地已经聚集了一群仁人志士。

按照李学勤教授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的汉学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汉学情况的调查了解 and 汉学作品的译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孙越主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就是代表。第二阶段是90年代,其标志

是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汉学专门刊物的出现。自1991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所之后,在北京相继出现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及中华书局的汉学编辑室等,先后出版了《国际汉学》、《法国汉学》、《汉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等书刊。第三个阶段,是当下正在进行和正在发生的汉学研究的深入和成熟。“把各国汉学和汉学家置于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既要有个案研究,又要有综合研究。”^①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显而易见,汉学就是“流”。当然,这个“流”也是相当浩瀚的。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到的翻译过来的汉学著作还非常少,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汉学著作也还没有译成中文。就是说,等待我们去做的工作还很多。另外,虽说汉学这块他山之石里蕴藏着不少真知灼见,但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误解、误读也随处可见,这也需要我们认真读书、思考、比较、梳理和研究。《列国汉学史》和《世界汉学史》还没有问世,从中外文化比较学等角度对汉学进行深刻理论研究的著作也还没有。这就是当下我们分散而不整齐、奇缺经费的汉学研究界所面临和正在从事的艰巨任务。

四

汉学的发生、发展和繁荣是点点滴滴、不知不觉的酝酿过程,它是漫长历史的智慧浸润出的花朵。

西方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与目的是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却共同滋润了汉学的发生和发展。汉学从盲目到自觉,从猎奇或政治到学术,是西方深入认识中国和东西方“磨合”的一个历史

^① 李学勤:《汉学研究·序》,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

过程。在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上,汉学的现代性表现为弱肉强食般的掠夺,近代史上汉学的成功积累是以中国的屈辱和痛苦为代价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有案可查或无案可考的中国文化典籍的惨痛被盗和“流失”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它们至今还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异国的文化场所或不见天日地躺在私人家中的阴暗角落;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之后,由于世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尖锐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汉学”成为政治的一个部分。本来汉学应该是从纯学术的襁褓中诞生的,但是学术却遭到了政治的强暴。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政治意识相对淡化,就汉学而言,随之而来的是学术意识的逐渐增强。

人类至今并没有摆脱战争的威胁。真正的文明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是21世纪,将给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机遇。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高速公路,不会把我们引到文化全球化的胡同里。文化交流,文化互补,始终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程序。这个程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就是说,高科技虽然影响文化的发展,但它不会使之变为一体化。所以,中国文化将会永久地存在下去,汉学和汉学研究也将永远存在和永远进行下去。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各国学者在人类新的历史时期,倍加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借助信息网络,“中学”外传便得以加大加快,所以各国还会产生更多的汉学家,汉学不但不会停滞,还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汉学研究也会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全球化”被认为是当今最重要的时代特征。由于人类经济上出现了一个并不完整的“全球化”联网,于是文化人便创造了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梦想。人们不断强调文化认同,强调“我们是谁”,而不是“我是谁”的问题。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90年代世界冷战后,爆发了认同危机,

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事实上,每个人首先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然后才属于世界。亨廷顿认为意识形态的对抗行将转化为文化认同差异的对抗。似乎我们不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也是与汉学和汉学研究有关联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条绿色通道,自然它会给文化带来巨大影响。但是人类文化只能认同一种文化吗?文化能够“全球化”吗?“全球化”是一元化吗?若是一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我深信文化永远都是多元的,虽然在网络上国家失去了国界,城市拆除了城墙,但是多数民族的文化都不会因此失掉传统,尤其像中国,中国文化的“中华性”之根基是不会动摇的。现在我们所预测的未来,是在没有硝烟的蓝天下进行的浪漫操作,事实上战争是可以粉碎任何美丽理想的。但是,不管世界怎样发生变故,中国文化不会消亡,汉学不会消亡,汉学研究不会消亡。当然,如果人类能在 21 世纪长期和平相处,东西文化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彼此接近彼此认识,甚至可以互补,兼容优长。

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东西文化毕竟互相接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比如交通、印刷出版、电信、信息网络等,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为汉学的发展和汉学研究的进行带来了便捷和好处。中国文化不再是囚禁在人类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逐渐把民族意识和当代意识结为一体的全新文化。

人类走到今天,各种文化是在斗争、排斥、拥抱、联姻、兼容的过程里发生、发展、没落和消亡的。文化借助于经济、政治的力量在变中求生存求发展,变则生,不变则亡。自然界存在竞争,社会存在竞争,文化也存在竞争;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但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其生存发展中,都必须破除自己的“中心主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精华,逐步自我完善,然后才能进步。

汉学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借鉴。汉学研究是对外

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21 世纪的新汉学,会包蕴更多的当代意识特征,而有别于 20 世纪以前的旧汉学。21 世纪的汉学研究,也一定会有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现状 之管见

□ 方 骏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学术界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突破了重重天然和人为障碍,终开起步车,形成了一种小气候,科研成果新累枝头,科研队伍初具规模。在出版界的书山报海中,也能偶拾几枚海外汉学作品之珠玑。无论是从思想观念的解放与转变、学风的端正、视野的开阔,还是从科研体制的改革与正规化上来看,都是令人欣慰的,出现了可喜可贺的局面。这应归功于那些既精通外语又有中国文化之功底的学者,这是他们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结果。如果这种势头能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中国科研与国际学术界的全面接轨,便指日可待了。

科研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与国际学术界全面交流,特别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资料共享,信息互通,成果共用。科学无国界,科研无禁区,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财富,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本属

于学术界的常规行为,在我国却跋涉过一条坎坷不平的漫漫长途,越过了无数障碍,才终被拨乱反正,步入正轨。数代学人筚路蓝缕,奔走疾呼,全身投入,才出现了这种来之不易的形势。吾辈晚学矣,在晚年也总算赶上了这种科学的春天。

何谓“汉学”,中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其实,《辞海》中为它下的定义,至今仍不失其公正:“外国人称中国学问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人称为‘汉学家’,今译‘中国学’。”我以为“汉学”主要是指对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国学”则是指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和地区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汉学、藏学、突厥学、蒙古学、满学等;“中国研究”则更加侧重于中国当代和现实问题。当然,这些领域都是互相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准确地截然区分。我们不妨用“汉学”统称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不凡,但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一些混乱,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

首先,我们承认,海外汉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资本主义商品大生产掠夺海外市场、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有着因果关系。当然,它与中国文化本身的魅力和中国的世界地位也密切相关。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继16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大发现或大航海之后,在西方殖民列强中兴起的三大东方学(中国学、亚述学、印度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殖民政策服务。西方汉学自16世纪初以来,其发展过程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基本上是同步的。18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经历了第二次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殖民列强大举向东方扩张而造成的。19世纪中叶,西方汉学经历了第三次发展,殖民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从他们在中国强行大量销售鸦片而发的不义之财、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支付的巨额赔款中,拔下九牛一毛,来从事

多方位的中国研究(办学校、教堂、医院、科研机构、出版报纸书刊、挑选留学生)。西方汉学的第四次发展则以 20 世纪初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为契机。西方整个 20 世纪的汉学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庚子赔款”。其中美国最具代表性。法国、比利时等国的汉学研究所,也是直接利用“庚款”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后,西方出现了相对和平环境与经济繁荣,同时也是出于东西方冷战和遏制中国的需要,汉学研究出现了第五次发展。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学研究成了西方与中国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的这第六次发展,这次的情况与前几次不可同日而语。政治斗争依旧存在,但已为汉学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联系中外学者友谊的纽带奠定了基础。

西方汉学一旦以强劲的势头发展起来之后,其结果就会突破其始作俑者的初衷。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在中国那魅力无穷的历史文化吸引下,多数汉学家都具有“学术正义感”。他们酷爱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化圈(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圈,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圈,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代表的希腊—罗马文化圈)之一的中国文化,仰慕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学者怀着真挚的友好感情。他们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研究中国的事业(实际上,“汉学”在西方从未成为一门名利双收的“富贵职业”)。他们的治学态度比较严谨,观点也客观公允。这一点在西方汉学界的考据派学者们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参考。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以他山之石攻玉的道理。惟有汉学家才是海外从深层次上真正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有识之士,他们是中国国学界的真正同行与知音。中国学术界要想赶超国际学术水平,与他们交流必然会大有裨益。